

风雨兼程

俄罗斯转型启示录

[俄] 米·伊·科金 著

刘燕明 邢艳琦 译校

中央文献出版社

风雨兼程

——俄罗斯转型启示录

〔俄〕米·伊·科金 著
刘燕明 邢艳琦 译校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兼程：俄罗斯转型启示录/（俄罗斯）科金著；
刘燕明 邢艳琦译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

ISBN 7-5073-1629-7

I. 风… II. ①科…②刘…③邢… III. 俄罗斯—概况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6607 号

风雨兼程

——俄罗斯转型启示录

作 者/〔俄〕米·伊·科金

责任编辑/田松年

封面设计/慧泉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850 × 1168 32 开 13.75 印张 341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ISBN 7-5073-1639-7/C·218 定价：24.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译校者

《经济篇》	刘燕明	译校		
《政治篇》	邢艳琦	侯静娜	曲延明	译
	邢艳琦	校		

作者简介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科金，1943年6月28日出生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基洛瓦巴德市（今甘贾市）。1966年毕业于基什尼奥夫拉佐工学院，1972年和1979年分别在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和莫斯科高级党校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来获社会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党的组织和干部部部长和摩尔多瓦共产党监察—检查委员会主席；1991年2月起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1996~1999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自然科学学院院士，俄罗斯安全、国防和法制问题研究院及中欧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99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标准局全俄标准化和质量认证分类、术语和信息研究院副院长；是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

社会活动家科金是“莫斯科知识分子—实业家俱乐部”（尼·伊·雷日科夫俱乐部）创始人之一，并任该俱乐部第一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作为社会学博士，他主要从事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著有7部专著和多篇论文，获现代人文大学“资深教授”称号。

俄文版编者的话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亚·季诺维也夫在《步入超级社会之路》一书中，对许多浅薄之徒目前大谈种种社会现象，大肆著书立说表示担忧。他认为，“目前这方面的情况的确很不像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文字糟粕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污染，决不亚于现代工业品及废料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几乎每一个多少受过教育的人，仅凭自己的阅历和对社会一知半解的了解，都自认为是解读社会现象的专家”。^①这一切都严重妨碍了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②

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重要的是揭示这种现象的根源。

俄罗斯近十年来发生的事情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搅扰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使俄罗斯的精英分成两个营垒。

每个精英代表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俄罗斯转型的实质及内容作出分析和评价，对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相关题材的出版物数量增多恰好说明俄罗斯社会“存在争论”，这种争论，按照约·斯·穆勒的说法，对社会意识的“教条主义化”起了阻碍作用。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① 亚·季诺维也夫：《步入超级社会之路》，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第26页。

② 同上，第27页。

与此同时，一些作者，作为叶利钦和那班年轻改革家选择的自由主义改革方针的拥护者或执行者（那就更糟糕），试图利用自己的作品向社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试图“掩饰”自己的过错。另一些作者对俄罗斯发生的变化作出了认真而又审慎的评析，对俄罗斯改革的未来命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社会学博士米·伊·科金理应属于上述第二类作者。作为《风雨兼程——俄罗斯转型启示录》一书的作者，他并未刻意地对他笔下的社会现象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析。倒是可以说，这是一位“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到普京当选总统期间的俄罗斯转型问题所作的思考。

俄罗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了激进改革的方针？这场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其社会后果如何？有关俄罗斯改革问题的哪些新观点颇具前瞻性？——这些都是科金试图在书中回答的问题。

当然，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些观点尚属一家之言，与对时局的解释也不无关系，但这都不是主要的。

本书的主旨是对俄罗斯的现实进行不带偏见的分析，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和对科学的崇尚之情，对俄罗斯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

Н. Г. 奥西波娃

目 录

经 济 篇

引言 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到叶利钦的激进改革	(3)
1. 文明改革构想与俄罗斯的现实	(21)
2. 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实践	(43)
3. 经济改革的社会政治后果	(85)
4. 有关俄罗斯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构想	(114)
结束语	(148)

政 治 篇

上 编 俄罗斯政治进程的转型

引言	(157)
1. 当代世界中的俄罗斯联邦。地缘政治现实	(167)
2. 后苏联空间：过去、现在与未来	(194)
2.1. 独联体内部非一体化的原因和实质	(194)
2.2. 俄白联盟的发展前景。社会学分析与预测	(202)
2.3. 重新一体化趋势：利益平衡	(239)
3. 俄罗斯的国家体制：现状与发展前景	(248)

3.1. 俄罗斯的统一。民族分离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	(248)
3.2. 俄罗斯国家的联邦关系：联邦主体相互作用的基础	(266)
4. 即将步入全球化社会的俄罗斯	(283)

下 编 俄罗斯社会的思想道德取向

1. 人民的精神和社会意识的退化	(294)
2. 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分析 （与 H. Г. 奥西波娃合著）	(310)
3. 探索新的民族思想。一些观点	(341)
4. 俄罗斯的公民社会现象。社会联盟及政党特点	(361)
5. 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历史社会学分析 （与 H. Г. 奥西波娃合著）	(376)
6. 俄罗斯是否存在文明改革途径？（思想道德方面）	(401)
结束语	(413)
参考文献	(424)

经 济 篇

引 言

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到叶利钦的激进改革

大凡学者，无论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代表人物，都一直关注“转折”时代的研究。

我们目前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时代。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代。容易轻信的人们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时就受到一个个“科学”解说的袭击，先是有人说什么“光明的未来”不再遥远，后来又抛出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我国学者近年出版的多数著作还是致力于坦诚而审慎地研究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致力于站在现实的角度上去设想不远的和较远的未来。

由衷地希望在俄罗斯现代史的一个最重要关头奉献给学术界的这部著作能够成为这样的著作。笔者在书中尽可能地以最为客观的态度再现近十年的“投机性”改革的历史、探究种种现象的根源，因为正是由于这一切，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直至今日还不能保持稳定，俄罗斯的社会领域才变成了随时面临崩溃威胁的“人质”，人民才陷入了赤贫和丧失权利的困境。

在改革已经进行了近 15 年的今天，俄罗斯学术界才提出一个有时让人十分痛心的复杂问题：业已开始的改革是否具有合理性，改革的进程是否符合文明、人道的社会通行的标准和原则。

80年代中期的苏联有多大的必要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何种形式、速度、深度和力度的改革才是可取的和符合国家及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和精神道德方面的改革主张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当权者”是否适度地正式宣布和明确阐述过这些主张，是否向社会作过通报？我们是不是又要重蹈历史复辙，被又一批不诚实的冒险家所欺骗？戈尔巴乔夫改革及此后激进的社会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否成了与全体人民休戚相关的事业？抑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无耻地追求狭隘小团体利益的一小撮狡猾的蛊惑分子得以用“臆想”和显然虚假害人的目标迷惑容易轻信的多数人？

如果想历史地看问题，不妨回顾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一切。

还是从80年代中期那场改革的匆忙开场说起吧……

可以大胆地肯定，早期的改革不是由别的什么，而正是由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感觉和意识到的、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地发展到需要进行有益变革的阶段，它吃尽了由年复一年的紧张劳作和有时是由令人恼火的错误决策而带来的苦头。

深谙国情的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尤·弗·安德罗波夫是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早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召开之前两年，他就作出结论说，必须制定首先是改革工业管理办法，尔后是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办法的计划。米·谢·戈尔巴乔夫、尼·伊·雷日可夫、弗·伊·多尔吉赫和科研生产领域的一些著名专家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扎扎实实地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① 这批首创者采取的实事求是、不带偏见的立场，使参与制定新方针的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停滞，第一次得出一个坚定而又严肃的结论：国家濒临危机。

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所作的详尽分析以及据此所作的总结

① 这些分析也为有关改革的文献奠定了基础。

首先表明，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了。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 50% 以上，到 80 年代初已降至使国家实际上接近经济停滞的水平。苏联过去一直以强劲的势头追赶着世界上的最发达国家，不断缩短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在某些领域不仅接近，而且赶上、甚至超过了 (!) 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可是现在却明显地交出又一个又一个高地。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的科技发展，即在生产和掌握新技术新工艺，包括具有广阔前景且亟待发展的信息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不仅会造成停滞，而且会使我国痛失大国地位，被世界进步所抛弃。

应当指出，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后工业化阶段（或者叫后现代时代）。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的那些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全球化特征。落在西方国家正在进行的进步性变革的后面，对于苏联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止步不前”。我们的国家势必“跌入”所谓的“第三世界”行列，到那时，这些国家与其说不得不去攀登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台阶，莫如说不得不在为争夺数量锐减的原材料而进行的异常激烈的全球性争夺战中艰难生存。

遗憾的是，对苏联社会中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和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有批判的分析的可能性一年比一年小。

社会科学首先负有客观全面地测评社会的自我觉悟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和谐规划的使命，可是这里却刮起一股故弄玄虚的空谈理论之风。在“停滞”时期，创造性思维在社会学中失去立足之地，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伪科学“著作”，有时甚至是现任党的领导人挂在嘴边的套话中的时髦词句作点缀的、随心所欲的肤浅评价和结论，倒成了不容争辩的真理，对这种真理只能做“死板教条的”解释，只能以不同调门加以重复。学术讨论、理论探讨和实用科学等领域的讨论缺乏创见，因

此名声很坏；然而离开了争论，思想就会僵化，科学创造活动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80年代中期的改革除具有上述必要性外，还具有正逢其时的特点；拖延改革的时间、优柔寡断地无视时代的客观要求已是无法容许之事。继续拖延改革的时间，也许不会导致“灭顶之灾”，但无疑会造成经济形势的恶化并进而降低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而这一切不能不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多数人都认识到，国家的发展（近几年甚至是倒退）速度与社会主义潜在的巨大能量极不相称，这种认识也对改革产生了不小的推动。

只要改革的主张尚未脱离更新、完善（哪怕是以最坚决最激进的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只要它把全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某些集团和团体的利益之上，它就仍然具有社会紧迫性和客观进步意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将这样的改革当作生命攸关的事业、予以支持，并准备以久违了的热情为实现它的任务和主张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的初期阶段是在开展真正的创造性争论，即发扬“公开性”，自由地交换对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看法的情况下进行的。

最高决策集团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亲自倡导下提出，要弱化对信息领域的控制，大幅度缩小对媒体的政治检查力度，这一举措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反响，对提高改革特别是改革领导者的威望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在苏联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改革问题自然地、顺理成章地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每一个人的命运。社会的多数成员越来越感觉到，后来则是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带来的变化会不同程度地触及每一个苏联人，触及生活中所有重要方面和那些积重难返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关心，也不能不

关心这样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生活？

必须强调的是，后来，也就是改革进程加快，向“纵深”发展之时，对社会政治最有推动力的人群，首先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后来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也开始思考和讨论改革问题。他们都希望弄清楚，在他们的国家——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去除政治欺骗和意识形态僵化的糟粕，以期获得真理的内核。媒体对他们要做的事情往往是不仅不予帮助，而且还对着干，媒体的宣传充满蛊惑骗人的货色、狡猾地歪曲事实真相，有时还公然扯谎。

改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改革摒弃的是什么，创造的又是什么？改革如何进行，它对苏联和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何？这些颇似修辞性的问题也由改革的总“设计师”之一戈尔巴乔夫提了出来。^①他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而且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他的回答并未过分掩盖这场变革的性质。

戈尔巴乔夫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他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②值得玩味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尼·什梅廖夫对戈尔巴乔夫这一定义所作的注释，他说，“这里指的是破坏性革命”。

我们也认为，人家的表达相当明确，这不是什么改革，而是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这本书中试图向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表明自己对其改革宠儿的态度，下意识地（也可能是完全有意识地）预先向本国人民和历史为自己“讨购”赎罪券，以便赎清将要犯下的滔天大罪。

② 同上，第37页。

有意识地破坏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

那么，进行新的破坏性革命的号召为什么没有引起苏联社会的惊恐不安？这首先是因为，号召本身带有咬文嚼字的修辞学味道，每一个苏联人对此都习以为常。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其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的努力下，加紧向人们灌输说，改革的所有任务都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轨道内完成，但是不搞后来的“唯意志论”的那一套，要为人们自由地、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营造宽松的气氛。比如，戈尔巴乔夫就卖力地宣传下列主张：“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我们改革的整个纲领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完全以‘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这个原则为依据的。”他还指出，“……我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离开它。我说的是实话，并不是向我国人民和国外玩弄花招。指望我们会着手建立另一种社会，非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到另一个阵营，那是要落空的、不现实的。”^①

这些充满善良愿望的保证在今天看来不是别的，正是对健康思想的嘲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彻底揭下了“面具”，打破了人们最后的幻想（人们原以为他不清楚自己都干了什么）。例如，斯洛伐克 1999 年第 24 号《曙光报》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我此生的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消灭不堪忍受的对人的专政。我利用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要达到的正是这个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我要撤换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所有领导人，还要撤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我也找到了实现这些计划的战友。其中亚·尼·雅科夫列夫和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二人为我们共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26 页。